

自序

这本书收录了1990至2015年，我在新加坡《南洋·星洲联合早报》所发表的部分文章。在这25年间，我前后有近十年的时间，因学业或工作的关系身居国外，而数度中断为报章写稿。这50篇是我在新加坡那15年间，在岛上不同角落所完成的评论文章：从1990年汤申路上段的维纳士购物中心（Venus Shopping Center），1996年三巴旺的惹兰马达亚逸（Jalan Mata Ayer）区，2006年裕廊西旁的西林台街（Westwood Terrace）到2015年马里士他区的惹兰拉马拉马路（Jalan Rama Rama）。

新加坡虽说不大，但因应政府对土地的规划、家人对经济、工作、就学等因素的考量，我的家在这四分之一世纪中搬了三次。我书写的地点也因此从岛的中间偏北迁到北部，又从北部移居西部，再自西部搬回中部；书写的工具则从稿纸和笔，演化为电脑键盘输入，再提升到电脑手写；报纸呈现的方式，则从纸张衍生到电脑，再从电脑迈入移动通讯器材；至于

我书写的内容也从早期专注于影视作品的评论，扩大至对影视导演、类型和趋势的观察，再发展到近十年来兼论本地语言、文化和社会等现象。

由于文章都是这些年我在岛上的某个时间点完成，而每一篇写作的起点总是和当时海外或岛内的某些事件或议题有关，因此多少记载了这25年来我对电影、媒体和新加坡社会等课题的看法。由于个别文章的篇幅有限，所记的事也往往零星且片段，每一篇充其量只能提出一、两点看法。在这些点与点之间，难免留有許多空白。这次能够将这些单篇结集成册，希望点与点之间能够形成有意义的衔接。在这其中，有些点之间的衔接轨迹是相对比较明显的，如台湾金马奖的变迁、新媒体的崛起、新加坡华文华语的困境、好莱坞霸权、影视媒体所面对的挑战和国家政治环境的改变等。为了便于找到点与点之间的关联，我将这50篇文章归类到(1)电影内外、(2)新旧媒体和(3)情牵岛国这三大单元。以下就书写这些单元文章时的相关背景和发展趋势做个概括式的说明。

电影是我的兴趣，也是引领我进入学术界的重要原因，因此本书中最早（1990年2月4日）和最晚（2015年12月6日）发表的两篇文章都和电影有关。电影内外这个单元虽然有述及西

方电影的部分（如《功夫小子》、《少年Pi》和《变形金刚》等），但侧重的主要还是华语电影¹。在这25年间，华语电影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是引领风潮数十年的香港电影在90年代中期以后盛极而衰，尔后又屡屡欲振乏力。相对的，在90年代因外来影片来势汹汹，以致于业界、学界纷纷表示前景不容乐观的中国电影，在2000年以后逐步的站稳脚步。并透过不同的措施确保自己所生产的商业电影，可以在国内市场有能力和好莱坞电影分庭抗礼。2013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电影市场。以其庞大的电影市场、六百多部的年生产量和充裕的制作经费，让中国仿佛一个超大型的磁场，吸纳台、港、马、新等地区的华语电影人才加入其生产的行列。从这个层面而言，中国作为华语电影的龙头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

在海峡的另一边，80年代以来台湾电影频频在影展得奖，却常常在票房惨赔的命运，在2008年以后因为《海角七号》的异军突起而得以改变。台湾另一个软实力在于它每年11月所举办的金马奖颁奖典礼。金马奖自1997年起就朝作为全球华语影片之竞赛这个定位努力，至今成为最具公信与声望的华语电影

¹ 这里所指的华语电影，除了指传统上以华语发音的电影外，也包含了以福建话、广东话、客家话、海南话或潮州话等华人方言发音的作品。

奖项。至于新加坡电影，在这25年间从无到有，而这些年来所生产的本地片当中，有相当数量可以被归类为华语电影。其中包括2013年在第50届金马奖获得最佳剧情片大奖的《爸妈不在家》。

在电影之外，媒体是另一个我长年关注的对象。新旧媒体这个单元的文章始于1996年11月，止于2013年9月。在这17年间，新媒体一个接着一个的出现，从90年代中期出现的互联网，90年代末的博客，到2004和2005年先后冒出来的脸书和YouTube；与此同时，电话从有线转为无线，从砖头大小的“大哥大”缩成手掌大小的手机，接着又因为进化成智慧型手机而长了面积加了功能。电话不再只是用来讲电话，也可以书写、拍照、录影和录音。集电话、相机、相册、录影机、电视机、记事本、地图、指南针、黄页、时钟和游戏机等多重功能于一身，只要一机在手，使用者可以做很多事情。于是多功能的手机，配合上其他同时兴起的新媒体，在短短十几年的光景，改变了我们所熟悉的媒体世界。新闻不再为电台、电视和报纸所垄断，YouTube、脸书和博客也可以是消息的来源。报导不再是传统媒体集团记者的专利，平民老百姓只要一机在

手，具新闻敏感度又能适时适地的去报导，都能够成为公民记者(Citizen Journalist)。

旧媒体开始在旧有的基础上架构新的可能性。报纸在纸版的基础上加了电子版，又加了流动应用程式（APP）版。电视节目不再局限在电视机前观赏，从桌电、笔电、平版到手机都是可以用来观看节目的平台。除此之外，还有几年的时间，新加坡曾经出现过电视台之间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可惜终究敌不过盈亏或其他的考量，又回到一家独大的格局。可是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纵使少了自家人的竞争，却也避不开收视率持续下滑的命运。韩流、美剧和中国实境真人秀在第一时间透过有线电视或网络视频直接送到阅听人的眼前。新加坡媒体要如何把流失在外的国人眼球重新争取回来，已经不仅是媒体业者，也是负责媒体的主管单位所要正视的问题。

我自2010年开始发表探讨新加坡社会、文化和政治现象的文章。在此之前，我对自己国家的观察文章大都局限在电影和媒体这两个领域之中。或许是因为我在这一年离开了教学十余年的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加入了新跃大学人文与社会学院，在工作环境改变的情况下，开始将长久以来对自己土地的思考诉诸于文字。又或许是因为我在2009年初为人

父，开始考虑到不仅是自己，也考虑到孩子在新加坡的未来。也或许是因为对新加坡许多事物的观察和体会多年来已经累积到不吐不快的程度，因此书写了情牵岛国这个单元中的十几篇文章。

从2010到2015这五年里，新加坡发生了几件具指标性的事件。首先是2010年因为母语在小六会考的占分比重可能会被削减，而引起讲华语社群高度忧虑和批评的事件。此事最终以总理和教育部长出面表示这是一场“误会”而告结。可是它显示了在这个以英文、英语为主，高度西化的社会里，还是有相当数量的新加坡华人认定华文、华语是传承华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其次是2011年的两次选举。五月的全国大选执政党有史以来首次丢失一个集选区，而八月的总统选举，执政党所属意的人选仅以微弱的优势胜出。这两次选举的结果让执政党警惕，也让它不再视新加坡人对人民行动党的支持为理所当然。上个世纪末那个被认为是对政治冷感的新加坡人在此时展现了他们的热度与激情。

再来当然就是2015年所发生的三件大事：(1)在政府带领下，新加坡欢庆建国50年，举国欢腾；(2)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

于三月过世，举国哀悼；(3)在举国欢腾与哀悼之后，全国大选在九月举行，执政党人民行动党获得七成国人的支持。这三件事情放在一起，一方面昭示了李光耀所代表的那个时代已经完全过去，另一方面人们在建国第二个50年的开始依然把希望放在人民行动党的手里。新加坡人这样的选择不仅仅是因为行动党过去50年的贡献，更重要的是因为在李光耀2011年完全退出内阁之后的五年间，执政团队表现依然亮眼，而且更愿意倾听人民的声音和关注他们的福祉。就在这么一个社会背景下，我有关新加坡语言、文化和选举等方面的文字顺势而生。

本书每一个单元根据文章发表日期的顺序来安排先后，这样的作法希望能够更清楚的标示出我在不同的时期所关注的课题。由于部分文章在上个世纪90年代完成，有些名称用语或事件始末在事过境迁之后，恐怕已经逐渐被人们淡忘，因此有必要在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或行文之后做些许说明。除此之外，各篇的文字都尽可以保留当年刊登时的原貌。

能够将这些文字集结成册，要感谢在这二十余年间我在人生不同阶段中所遇到的贵人。首先要感谢这些年来，早报言论版不同时期的编辑们，尤其是庄永康、黄向京和王美燕。感谢

他们的催促、协助与指教，让我可以一篇接一篇的写下去。也要感谢八方文化创作室的何华和刘馨薇促成本书的出版，以及责任编辑冯婉明以她的火眼金睛揪出那些我视而不见的错误。另外要感谢国家艺术理事会支持和赞助本书的出版。

最重要的是感谢为本书写序的郭振羽教授。我于1996年因为加入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²而与郭教授结缘，认识至今已经20年。在前面的十余年，他是遥不可及的教授和高高在上的院长。记得当时在学院的走廊或茶水间碰到他时，我都以院长称呼他。他好几次提醒我在院里大家都是同事不需要那么拘谨，以Eddie³来称呼他就可以了。我却始终没有办法改口，

² 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的前身。传播学院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于1992年成立，由郭振羽教授担任创院院长。成立之初，设有四个传播相关科系，分别为新闻与出版系 (Journalism and Publication Division)、电子与广播媒体系 (Electronic and Broadcast Media Division)、宣传与公共关系 (Promotion and Public Relation Division) 和传播研究系 (Communication Research Division) 2002年因加入信息学系 (Information Studies) 而改名为传播与信息学院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 Information)。2006年为纪念前一年过世，记者出身的前总统而改名为黄金辉传播与信息学院 (Wee Kim We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我于1996年首次加入传播学院的电子与广播媒体系，1998年因为到美国念博士而离开。2000年再次回到学院，直至2010年才再次离开。在学院的12年间，两度改名的盛事都碰上了。其中2006年那年还直接参与了学院改名典礼筹备小组的工作。

³ 郭振羽教授的英文名字是Eddie Kuo。在非正式的场合，朋友或同事大都叫他Eddie。

因此叫了他多年的院长。这个叫法一直持续至我到新跃大学任教，再次与他共事时才改过来。改变的关键在于在这段时间我们共同为两件事而努力。第一是成立以华语和英语双语教学的华文传播学士学位课程，第二是成立新跃中华学术中心。第一件事由于屡次招生成绩未达标而无法推出。第二件事在他的引领下，中心顺利的做了不少事。在几乎天天见面的情况下，久而久之不知不觉的也就以 Eddie 来称呼他了。在这段时间里，他有时候会在谈事情中场休息时说说我刚发表的文章，有时候会在看完文章后发来简讯给我鼓励，还有一两次大概看我停笔太久了，提醒我是时候该写写文章了。因此请他来写本书的序是最适合不过的。在此要感谢他在百忙之中为本书写序。

这本书要献给先父符敦瑚先生和母亲邢兰花女士。我父亲是名华文小学的老师。据母亲说，我进华校是在他的坚持下做成的决定。记得三年级时念的是上午班，父亲下了课会到学校接我回大巴窑组屋的新房子。由于母亲忙着汤申路店里的工作，弟弟中午时分不在家里，因此就我们父子俩一起吃午饭。用完餐我做我的功课，他忙着改作业或处理学校的行政事务。我做完功课之后，他会让我背成语，每天背十句，背着背着往往就睡着了。父亲在2004年过世。回忆他的时候，我最常想到

是那段在大巴窑家里父子俩独处的时光。母亲是我在家中最忠实的读者。问她对我刚发表的文章有什么意见？她的回答永远是正面的。她没有受过几年正规的教育，却自修掌握了中文。退休后她在家中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阅读。小时候她常嘱咐我和弟弟要多读报纸，多了解时事。每天晚上十点一到，一定会打开电视看新闻。她在家中的名言是“不看新闻，敌人打到家门口，你都不知道”。这本书中有不少篇幅是对应着时事议题而写，这与她当年的教诲应该有些关系吧。